

现象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起到了从一滴水看大海的功能。

当然,史料并不等于史学。本书没有停留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宣泄作者对人间不平的抨击上,而是对“猪花”现象进行了深层的理性思考。作者指出那些用尽鬼蜮伎俩拐卖妇女的人贩子不过是产生“猪花”的表层原因,而更重要地是它反映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将亚洲导致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给广东社会带来的苦难。香港和海峡殖民地(包括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和拉布安四大贸易中心)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把贩卖“猪花”称作“东方的三角贸易”,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者榨取中国妇女血汗的露骨自白。可儿弘明先生在研究了大量资料后得出结论说:“毋庸置疑,使香港成为令人颤栗的掠卖人口舞台的,正是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社会。”从而确认中国封建主义制度和西方殖民主义制度是造成贩卖“猪花”浪潮的罪恶根源。这一具有高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断,不仅受到中国史学界的欢迎,而且必将成为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共识。

我认为掠卖殖民地人口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丑恶景观,它对资产主义高唱入云的“人权”不可侵犯论,是个辛辣的讽刺。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剥削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对本国劳动者剥削程度的百倍,而对这些国家的妇女的剥削程度则又远远超出百倍。在旧中国,妇女沙民地人民剥削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对本国劳动者剥削程度的百倍,而对这些国家的妇女的剥削程度则又远远超出百倍。在旧中国,妇女身上被黑暗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捆绑着,而她们一旦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人口的魔网,沦为“猪花”,则失掉一切人身自由和权利,成为资本主义的奴隶,只要她们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是决不会罢休的。有些人不知道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剥削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也不了解殖民

主义者吞噬过多少“猪仔”、“猪花”年轻的生命,那就请认真读一读可儿弘明先生的《“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吧!透过历史的云层,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贩卖人口、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本书译校者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使译文流畅达,构建成信、达、雅的译作,为中日学术交流增添了新的篇章。

中国航空工业先驱

——记刘佐成 李宝焯两先生

赖 华

1912年3月,在南京,研制成功一架飞机,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震惊了虎视眈眈的列强。这丰功硕果,是我国福建永安两位留日归来的刘佐成和李宝焯两先生所呕心沥血取得的成果。

刘佐成:原名佐臣,后改佐成,字鹰公,又名国云。福建永安清水池村人。他向往新学,就与贡川肄业生李宝焯之弟李宝焯同至全闽师范学堂,肄业后由政府保送去留日。

佐成先生偕同宝焯先生东渡日本东京后,他先后就读工兵航校及早稻田大学。1909年,佐成先生于日本留学时与宝焯先生合作共同研究当时的新兴工业——制造飞机。对此,中日双方政府,都非常注意。他俩在日本因为飞行场地无法解决,没有进行实验。后经清驻日公使胡性德转报清朝廷,清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洋去电:“召刘佐成、李宝焯二人回国”。才由驻日公使咨送返国。

佐成与宝焯两先生返国后,于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9月),由清军咨府拨款,在北京南苑虎骨毅

军操场,建筑厂棚,进行制造飞机。归由第一厅厅长陈其采督率节制。

1910年冬,刘、李二人合制的首架飞机未获成功。次年春三月,经佐成先生研究改进制造出飞机二号,并由他亲自驾驶,凌空腾上了北京古城的蓝天,俯瞰宏伟的万里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意志与智慧。但因发动机损坏坠落而失败。他身受重伤,从此佐成先生就不亲自驾机了。

1911年11月,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佐成先生就任武昌都督府航空队长。当时该航空队购有法国制造的“桑麻式”飞机二架。

1912年3月,佐成先生与李宝焯先生合作,于南京研究制造飞机成功,写下了我国航空史上光辉的一页。给中华民族增加了光彩。

佐成先生在日留学时与李宝焯均参加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当袁氏窃国称帝前夕,曾与人密谋行刺杀当时的福建省总督李厚基,事泄逃往台湾。后转道日本回国。

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时代,他任航空大队长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这时,他培养了4名得意门生:一是福建南平的萧祥熒,他于广州驾自制“波特斯”飞机往汉口时,因机身损坏降落在湖南大山中冻死;二是福建尤溪的张慕超:因思想变化,削发为僧,不知去向;三是福建崇安的衷立人,1949年时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四是福建沙县的刘牧群(又名刘芳秀),曾任国民党空军训练少将司令,带着去台。

佐成先生在北平时,传吴佩孚的老部下冯玉祥将倒蒋时,有托他带10万元往日代购飞机。冯失败后,他仍将原款如数还冯。足见他为人忠诚可靠。

佐成先生在天津及南京时,他自己出版有《飞行杂志》和编写过《中国航空沿革纪略》及《航空纪载汇编》等,由南京《飞行杂志》社于1930年出版。

后来佐成先生调任浙江衢州航空总站股长。旋又调临福州飞机长任空军中校场长。这时他与福建海军省宿李世甲、萨镇冰等交谊甚笃,笔者在福州求学时代因同乡兼世交关系也与之会过几次面。他身体魁梧,精神焕发,待人和善,是位诚笃可亲可敬的长者。

抗战爆发后,福州不久沦陷。佐成先生调至将乐任空军办事处主任。尔后调柳州空军司令部任参谋。后来回永安故乡休养,因中风而于1943年秋患脑溢血与世长辞。

佐成先生毕生从事航空工作,为我国航空事业

创建了不朽功勋。但因他为人忠厚老实,不趋炎附势,所以不能获得当时政府的重用,未能充分发挥其才智。于抗日战争艰危时日而长眠,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他临终时还吩咐其家人:丧仪要简,切不可铺张浪费。所以只是薄薄地埋葬于其故乡黄土中。一代航空英杰,寂寂无闻,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李宝焯先生字焯甫,乳名汉老,清光绪十二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县一个常被浓雾笼罩着,天阴对面不见人的小村——洋家畲。他排行第三,年14跟他两位哥哥进县城应童子试,两个哥哥双双考中,他名落孙山,但他却不在意说:“考经书八股,有啥用处?我要做实实在在有出息的人。”足见他年纪小,志气高。

1906年春,刘德骥先生在贡川创办龙山两等学堂,他即往就读。同年秋,其兄宝镛自福州回来,说:陈宝琛先生在福州创办的全闽师范学堂办得很好,他就跟其兄宝镛在福州该学堂去就读。他年纪虽小,但学习成就很好,极受日籍教授器重,鼓励他往日本去深造。

1907年秋,他与刘佐成均被政府选送赴日留学。“有志者事竟成”,终遂其出国留学的心愿。

他同刘佐成东渡日本后,先就读于同文、宏文两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当时世界各国都在研制飞机,他对这门新兴科学极感兴趣。便与刘佐成先生合作,专心研究,很有造诣。他俩将研究心得,在《朝日新闻》等报上发表,引起了当时中、日双方政府注意。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他和刘佐成奉召返国,进行飞机制造。这时,宝焯先生还发表了一篇很有价值的我国第一篇航空论文《研究飞行报告》,文章发表后,很受国内外人士赞赏。

宝焯先生在北京,觉得给清政府制造飞机事与愿违。因他在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所以当首架飞机试飞失败后,即以购买机件为名,南下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宝焯先生到沪不久,武昌起义成功,终于推翻了专制政府,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共和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实行“三民主义”新政治。1912年,宝焯先生到南京着手试制飞机。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嘉奖,特正式任命他为“陆军中校飞行营营长”。他即发表《创建北伐飞军队,征求革命同志书》,创立了第一支革命空军。

当时李宝焯先生在南京正拟大规模建设飞机制造厂,但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

顿成空架,宝先生梦寐以求的航空事业,因无人支持而面临夭折!他心急如焚,便急往上海与资本家们商议,将自家在沪资产作抵押,请求他们帮助完成其事业。征得了章庆候等资本家的乐意协助,才勉强维持下去。怎奈他积劳成疾,不幸于是年8月26日疾终于南京营次!时年仅26岁。

简论夏庭芝的戏曲

论著《青楼集》

蓝凡

夏庭芝,元末明初人,约生于元延祐年间(1316年)左右。字伯和,一作百和,号雪蓑,别署雪蓑钓隐,一作雪蓑渔隐。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著作多散失,仅《青楼集》一编幸存于世。《青楼集》一书,最初见于《录鬼簿续编》的著录。后来清人瞿世瑛的《清吟阁书目》里所收此书,亦题为“元夏伯和撰”。据原书《说集》本卷首附载作者的《青楼集志》一文的署题,可知成书年代当在元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年)。即元末朱元璋起兵反元的那一年。而据张择在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年)写的序文,似乎夏庭芝在成书后又修订过一次。据夏氏撰的《青楼集志》,《青楼集》之后,应该还有一本专述男艺人的专著,“至若末泥,则又序诸别录云”,可惜这部“别录”却未见传世。“《青楼集》者,记南儿诸伶之姓氏也”(张择《青楼集叙》),《青楼集》全书记录了元代几个大城市110余个戏曲、曲艺女演员的生活片断,从早期的著名演员珠帘秀等人写起,其中“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

(《青楼集志》),并对50余位演员的演技作了评论。夏庭芝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不去赞扬当时的达官贵人,“硕氏巨贤”,反而“记其贱者末者”,称赏这些不入经、史、子、集的梨园女伶,在当时来说是很有些胆识的。《青楼集》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史料意义,其从中反映出来的戏剧审美见解,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元代末期的戏剧审美倾向和风神。

夏庭芝对戏剧审美的认识主要是就演员的舞台表演而论,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方面:“厚人伦,美风化”的戏剧审美功利观,歌唱上的“寻腔依调”和表演上的“步线行针”的审美要求。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乐记》所提出来的美学主张,后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艺美学理论的核心。当然,夏庭芝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仅仅是重复了前人的这种审美见解,而在于他是从当时的社会实践出发,以及从戏剧审美的发展性上,来记述他的“厚人伦,美风化”的戏剧审美功利观。首先,夏庭芝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加上他自己的切身感受。他认为,元杂剧艺术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可比,甚至不“可同日语矣”,其原因,正在于这些杂剧作品没有落“谑浪调笑”之俗套,而有“厚人伦,美风化”之美。他例举《赵礼让肥》、《杀狗劝夫》、《范张鸡黍》等剧,指出这些剧目的好处就是具有感发人心的教育作用。夏庭芝生活的年代,正是农民起义峰起,社会极端动荡的时期,“厥一纪,东南兵扰,君值其厄,资产荡然,豫损之又损,其庶几乎?”(《青楼集叙》)其家资为之扫荡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凡寓公贫士,邻里细民,辄周急贍乏”,可见其为人有一定的正义感,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正是鉴于这种思想基础,他才“弗究经史而志米盐琐事”,追忆记昔,“于心盖有感焉,因集成编,题曰《青楼集》”。当然,从别一方面说,就夏庭芝所举的其它一些剧目来看,他所提出的“厚人伦,美风化”的审美功利主张,仍没